

文化距离、地域认同、社会资本与 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

田北海,马艳茹

(华中农业大学 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在城乡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作为中西部乡土社会曾经的缺场者,回流农民可能面临回流后的文化再适应问题。将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视为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能动行为,构建了“情境—动力—资源”的适应行为分析链,将文化距离视为文化再适应的情境要素,将回流地地域认同视为动力因素,将社会资本视为能力因素,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较高,呈现出“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的结构特征;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是受文化适应情境、适应动力和适应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与回流地的文化距离尤其是回流地的差异是导致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困境的重要情境因素;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是促进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动力因素;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关系网络融洽度是提升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资源因素。

关键词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文化距离;地域认同;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 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1)05-0098-12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1.05.01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轨道。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人口的市民化,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农村人口的乡城流动与迁移。研究表明,人口向外流动常常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回流^[1-2],即乡城人口大迁移不仅表现为农民进城,还表现为农民工返乡。但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回流农民面临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还有生活环境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世界意义的重构^[3]。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流农民也是回流地的陌生人。在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中,文化适应是社会适应中最直接、最深入、最困难的环节,相应地,文化再适应水平则是衡量回流农民是否融入回流地社会的关键指标。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高低可能会影响其在当地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回流农民长期在城市生活,现代化的经历使得他们比留守居民更具有城市性与现代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回流农民回到家乡所在地创业就业,在带动当地居民就业、传播现代文明与观念方面的作用初显,是回流地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带动者,是当地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4]。另一方面,部分回流农民面临着失业、社会关系断裂等适应问题,这些适应困境可能导致上述群体“游民化”“灰恶化”的风险,冲击当地社会和谐稳定^[5]。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回流农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扶持政策,加强指导服务”,支持返乡人员在乡村创新创业。为此,了解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探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回流农民的再适应,更好地释放回流农民的潜力,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收稿日期:2021-06-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城人口迁移中回流农民的社会再适应及治理机制研究”(17ASH013)。

一、文献回顾

关于回流农民在回流地的文化再适应状况,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回流农民能很好地适应回流地生活。如,有研究指出,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在年老体弱后回到家乡^[6],利用既有的市场圈、婚姻圈和祭祀圈,重新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7],从而快速融入村庄共同体之中;有明确目标主动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能通过对乡村文化解构与重构适应当地生活^[8]。另一种观点认为,回流农民在回流地文化再适应状况较差。相关研究指出,被动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再适应过程并不顺利。他们难以适应不完善的基础设施^[9]、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10]和传统的乡规民约^[11-12],因此常沉迷于吃喝玩乐等娱乐活动^[13],甚至还出现了灰恶化和集体行动^[14]。

关于回流人口文化再适应的影响因素,学界主要有三种分析视角:制度文化视角、社会认同视角和社会资本视角。制度文化视角认为制度环境是移民文化再适应的主要驱动力,可能促进或限制他们在当地的文化再适应。回流地的发展水平、文化习俗^[15]、回流地居民对回流人口的态度^[16-18]等都会影响移民在回流地的文化再适应状况。社会认同视角认为,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9]。作为一种价值观,社会认同是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20-22]。社会资本视角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可以动用这种关系来获得其他资源,如金钱、工作和知识等^[23]。回流农民在回流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转化为其文化适应优势^[24-27]。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侧重于原居地回流农民,缺少对新居地回流农民的关注。多基于制度文化视角,侧重关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城镇化水平差异等部分适应情境因素的影响,忽视了回流农民因外出务工造成的与当地社会之间时空距离的作用。同时,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结果不仅仅是客观适应情境的问题,其主观的适应动力及个体适应资源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多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分析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现状,鲜有学者运用标准化量表对其文化再适应水平进行测量。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实证分析适应情境、适应动力和适应资源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可能影响,并关注原居地回流农民与新居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差异。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1. 理论框架

综合已有定义,本文将回流农民定义为从本县外出从事非农职业1年以上(含1年)后返回本县内居住、至少1年内不打算再次外出的农业户籍人口。将文化再适应界定为回流农民在与回流地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与行为上的积极反应。为深入比较回流农民对不同维度的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差异,本文将文化再适应划分为物态文化适应、行为文化适应、制度文化适应与观念文化适应四个维度^[2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融合加快,农村发展加速。但农村仍然落后,城乡失衡依然存在。因此,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情境考察。对于因长期外出缺席乡土社会的回流农民而言,城乡、区域间的文化差距是文化再适应的前提。可见,回流地与外出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情境。此外,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主动适应是影响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动力因素;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资源因素。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将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视为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能动行为,构建了“情境—动力—资源”的适应行为分析链,分析适应情境、适应动力和适应资源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可能影响,分析框架如图1。

2. 研究假设

(1)文化距离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背景下,城乡、区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文化差异。回流农民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耳濡目染了都市现代文化、工业文化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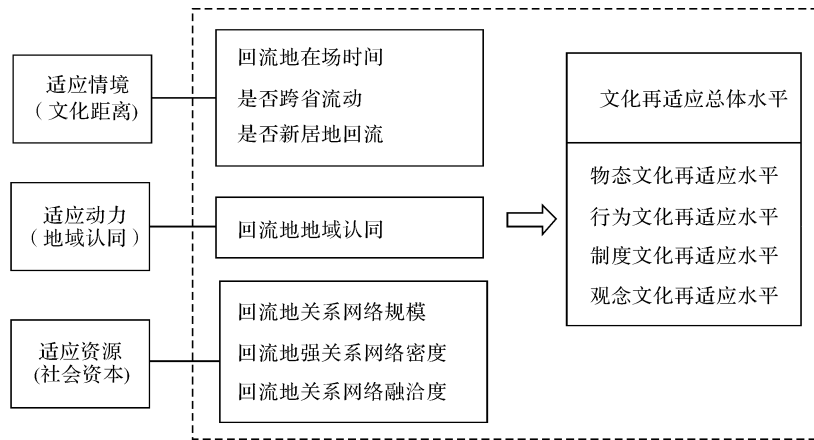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市场文化。当他们回流到小城镇或农村地区时,面对的是不同于都市文化的乡土文化、不同于工业文化的农业文化或半工半农文化,以及带有深厚行政指令特征的半市场文化。回流农民要想顺利融入回流地社会,或多或少地要改变其原有的理念、习惯与行为方式,以适应回流地文化环境。对于回流农民而言,其所遭遇的文化差异甚至文化冲突程度不尽相同,文化再适应的目标与难度也不尽相同。在影响流出地与回流地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距离是一个关键变量。文化距离差异体现于因外出务工导致的与回流地之间的时间距离差异、空间距离差异以及回流地类型差异。

作为回流地社会曾经的“缺场者”^[29],回流农民或多或少会出现家乡文化记忆模糊、文化熟悉感下降等问题。回流农民离开原居地的时间越长、回流后在回流地的居住时间越短,意味着其在回流地的缺场时间越长,对回流地文化的记忆越模糊、文化熟悉感越低,文化再适应的难度越大。反之,回流农民在回流地生活的时间越长,与回流地的文化互动越深入,其对回流地社会的文化认知越全面、理解越深刻,文化再适应水平可能越高。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1 在回流地生活的时间越长,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当生活地点发生变化时,人们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活环境、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差异^[30]。两地的社会差异越大,这种结构性差异给回流农民带来的冲击与压力也就越大;两地之间空间距离越小,人们越容易确切地理解当地社会^[31-32]。而空间距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地之间社会文化差异的大小。一般而言,省际比省域范围内存在文化差异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相对在本县务工的农民而言,跨县务工的农民面临更大程度的适应难题,这也体现了空间距离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1.2 相对省内流动的回流农民而言,跨省流动的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更低。

并非所有的回流农民都返回到户口所在村(居)。本研究将回流到户口所在村(居)的回流农民称之为原居地回流农民,将回流到户口所在县、但并非户口所在村(居)的回流农民称之为新居地回流农民。对于回流到原居地的农民而言,曾经的乡土生活经历和文化记忆会在其大脑中刻下深刻的文化烙印。尽管原居地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弱化,原居地文化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但那毕竟是他们曾经的故乡,熟人关系网络并未完全断裂^[33-34],心理归属和社会支持的可达性与便利性使其有更大的文化再适应优势。因此,尽管他们也会面临文化差异或冲突,但影响可能相对较小。然而,对于回流到新居地的农民而言,新居地文化既不同于回流前其在城市中习得的都市文化,也不完全同于其在外务工经商前在原居地习得的乡土文化,而是近乎完全陌生的地域文化。相应地,他们面临的可能是都市文化、原居地文化与新居地文化三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文化再适应的难度可能更大。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 1.3 较之回流到原居地的回流农民,回流到新居地的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更低。

(2)地域认同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在遭遇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时,并不是每位回流农

民都觉得有必要去调适自己的观念与行为。在影响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动力的诸多因素中,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感是一个关键变量,它可以提升人们的自尊,提高其内心的安全感、满足感与归属感^[35]。所谓地域认同感主要是指,回流农民希望在回流地长期生活,而不是将回流地视为暂时栖息之地;回流农民将自己视为回流地的一分子,将当地居民群体视为自己的内群体,而不是游离在回流地社区或自我隔离于居民群体之外^[36]。一般而言,对回流地地域认同水平越高的回流农民,其融入当地社会的需求越强烈,文化再适应动力越强,文化再适应行为越积极,文化再适应的水平可能越高^[37-38];反之,那些对回流地地域认同度较低的回流农民,其融入当地社会的需求较弱,文化再适应的动力不足,文化再适应行为消极^[39-40],文化再适应的水平可能越低。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度越高,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3)社会资本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回流农民能否顺利适应回流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适应条件或资源。文化再适应是文化互动的过程,即适应主体在文化交往过程中认知异文化,感受并理解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进而调适自身观念与行为,甚至影响他人观念与行为,以达至文化融合的过程。在文化再适应过程中,关系网络及嵌入其中的资源是重要的社会资本^[41],也是增进理解、求同存异、促进融合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在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密度越高、关系越融洽,回流农民认知回流地文化的机会越多,促进文化融合的社会条件越充分。

关系网络规模对文化再适应的影响表现为“熟人多了好办事”,熟人关系网络能为回流农民在文化再适应过程中提供决策、信息、情感等多元化的支持^[42],有助于网络成员间实现信息共享、风险共担,从而促进回流农民适应回流地的文化生活。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1 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是多元的,既包括生成性关系,也包括继承性关系^[43]。相应地,回流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乡土社会中血缘、亲缘为主的关系网络,另一部分是外出务工后建立的以业缘、趣缘为主的关系网络^[44]。有研究表明,关系网络中亲属的比例越高,网络密度就越大,个体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越高,网络资源也就越有限,边燕杰等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在上海、深圳、武汉和天津四个城市的调查,胡荣等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在厦门市的调查^[45-46]。与在城市开展的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回流到县、乡和村(居)的农民。较之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关系网络,其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密度及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作用方向可能有本质的区别。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遭遇困境时,回流农民首选的求助对象往往是家人与亲戚,而且家人与亲戚也确实能提供支持。这意味着在半工半农的回流地社会,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强关系网络仍然是回流农民的主要社会联系纽带;较之弱关系,强关系网络更有助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据此,提出强关系网络假设如下:

假设3.2 回流地的强关系网络密度越大,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关系网络融洽度是指个体在既有关系网络中与他人互动的融洽程度。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融洽度越高,回流农民与当地社会互动的积极性越高,在遭遇文化冲突时,他们化解分歧、求同存异甚至求同去异的可能性越大,文化再适应过程也就更顺利。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3 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融洽度越高,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越高。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1. 数据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8年8月至9月以及2019年7月至8月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为不等概率抽样,具体抽样过程如下:第一阶段,根据调查的方便性及回流人口分布的均衡性,选取了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和攸县,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和遵义市播州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和谷城县,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和罗江区8个县(市、区)。第二阶段,在以上8个县(市、区)分别抽取4至6个回流人口较多的行政村(小区)、4个企业以及1条商业街。第三阶段,在每个行政村(小区)进行系统抽样,在企业采取整群抽样,在商业街进行立意抽样选取回流农民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700份,

共收集到当地居民样本 1058 个,回流农民样本 586 个。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适合本研究的回流农民问卷 54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52%。

2. 变量及其测量

(1) 因变量。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总体水平,通过该变量测量回流农民整体层面上的文化再适应状况。此外,通过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 4 个子维度进一步了解回流农民在不同文化再适应领域的状况。各因变量的操作化方法如下: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主要用于考察回流农民对回流地居住条件、生活便利度和生态环境等物态文化的适应程度。对于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本文通过以下三个题目进行测量。即:“与您返乡前的想象相比,本县的居住条件如何?”“与您返乡前的想象相比,本县的生活便利如何?”和“与您返乡前的想象相比,本县的自然环境如何?”。将受访者的回答做如下赋值:“非常习惯=4,比较习惯=3,不太习惯=2,很不习惯=1”。这三个问题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2,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上述 3 个项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主要用于考察回流农民对回流地生活方式、交流习惯和本地语言等行为文化的适应程度。课题组询问了被访者对“日常作息时间安排”“交通规则意识”“饮食习惯”“购物习惯”“聊天、谈家常的方式”和“说话时使用方言,不用普通话”是否习惯 6 个问题。将受访者的回答做如下赋值:“非常习惯=4,比较习惯=3,不太习惯=2,很不习惯=1”。这 6 个问题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3,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上述 6 个项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主要用于考察回流农民对回流地习俗、禁忌等地方规范的适应程度。课题组询问了被访者对“婚丧嫁娶、升学、添丁、迁居仪式”“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乡规民约”和“禁忌事项”4 个方面的适应情况。将受访者的回答做如下赋值:“非常习惯=4,比较习惯=3,不太习惯=2,很不习惯=1”。这 4 个问题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8,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 4 个项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变量。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主要考察回流农民对回流地居民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念的适应情况。我们询问了被访者对回流地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念是否习惯。将被访者的回答做如下赋值:“非常习惯=4,比较习惯=3,不太习惯=2,很不习惯=1”。这 2 个问题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0,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上述 2 个项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变量。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上述 4 个维度、15 个题目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4,说明其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据此,取上述 15 个项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一个连续型变量。此外,15 个题目的 KMO 值为 0.903,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 5028.672,相伴概率值为 0.000,表明该量表可以做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 4 个因子,进行因子旋转后,将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生成“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因子”。

(2) 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回流农民的文化距离、地域认同和社会资本。

文化距离变量。文化距离是指人们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由于两地之间地理空间遥远、发展水平或文化习俗差异所产生的距离感^[47]。对回流农民而言,文化距离由回流地在场时间、回流地与外出地的空间距离和回流地类型三个子变量组成。第一,对于回流地在场时间变量,通过询问“您最近一次外出后,回流到本地的时间?”和调查日期两个问题进行测量。用调查日期减去回流时间点,生成“回流地在场时间”一个连续型变量,以月为计量单位。因为数值差距较大,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第二,省际与省域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地的文化差异程度。如果“调查地点”与“最近一次外出务工地点”在不同省份,则取值为 1,代表“跨省流动”,否则取值为 0,代表“省内流动”。第三,对于回流地类型变量,通过询问“您的现住房所在地与户口所在地是否在同一个地方?”进行测量,设置了“在同一个村(小区)”“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但不在同一个村(小区)”“在同一个县,

但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和“在同一个省,但不在同一个县”4 个选项。如果“在同一个村(小区)”,变量取值为 0,代表“回流到原居地”,否则取值为 1,代表“回流到新居地”,生成“回流地类型”一个二分变量。

地域认同变量。为测量回流农民的适应动力,选取了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这一变量。课题组设计了“我是本地人的一分子,和本地人没有本质区别”和“生活在这个地方,我有叶落归根的感觉”两个题器。每个题器的赋值为:“符合=4,比较符合=3,不太符合=2 与完全不符=1”。得分越高,表明回流农民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水平越高。取两个题目得分的算术平均值,生成“回流地地域认同”一个连续型变量。

社会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由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和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三个子变量构成。第一,对于回流农民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规模变量,课题组通过询问“在街坊邻居、亲戚、同事、朋友、政府/小区领导干部中,与您关系较为密切的合计有多少人?”进行测量。“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是一个连续型变量。由于该变量存在极端值,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 1%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的影响。第二,对于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变量,课题组通过询问“在街坊邻居、亲戚、同事、朋友、政府/小区领导干部中,与您关系较为密切的合计有多少人?”和“在亲戚中,与您关系较为密切的有多少人?”两个问题进行测量。通过用“较为密切的亲戚人数”除以“关系网络规模”,生成“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一个连续型变量。第三,对于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变量,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您与周围的人关系相处如何?”进行测量,将被访者回答做如下赋值:“总是很融洽=4,比较融洽=3,经常有隔阂或冲突=2 和总是有隔阂或冲突=1”。得分越高,表明回流农民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融洽度越高。本文将该变量处理为一个连续型变量。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个体经济地位可能对回流人口文化再适应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区域特征,以湖南省为参照组,引入湖北省、贵州省、四川省 3 个虚拟变量,详见表 1。

表 1 变量基本信息

变量	变量含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3.373	0.430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因子	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因子得分	0.000	0.599
因变量子维度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3.192	0.724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3.455	0.496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3.354	0.585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算术平均	3.439	0.590
核心自变量			
文化距离			
回流地在场时间	回流地在场时长(月)	82.790	77.353
是否跨省流动	跨省流动=1,省内流动=0	0.894	0.308
是否新居地回流	新居地回流=1,原居地回流=0	0.345	0.476
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测量指标算术平均	3.546	0.593
社会资本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	个体交往密切的总人数	37.013	32.533
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	个体交往密切的亲属占关系网络规模的比例	0.297	0.153
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	个体对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的评价	3.609	0.510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0	0.547	0.498
年龄	调查时受访者的实际年龄	38.885	9.700
受教育水平	个体的受教育年限	10.153	2.332
健康状况	个体受访时健康状况:患大病=1,患慢性病=2,体弱=3,健康=4	3.878	0.446
个体经济地位	个体对经济地位的评价:中层以下=1,中层=2,中层以上=3	1.495	0.627
所在地区	湖北省=1,其他=0	0.204	0.404
	贵州省=1,其他=0	0.274	0.446
	四川省=1,其他=0	0.182	0.387
	湖南省=1,其他=0	0.339	0.474

3. 模型设置

本文的因变量依次为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5 个因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自变量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的公式为:

$$y_i = \beta_{i0} + \sum \beta_{ij} x_{ij} + \omega \quad (1)$$

式(1)中, y_i 是第 i 个因变量,在模型中代表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及不同维度的文化再适应水平, x_{ij} 代表第 i 个因变量的第 j 个自变量, β_{ij} 是自变量 x_{ij} 对因变量 y_i 的回归系数, β_{i0} 是常数项, ω 为随机误差值。

四、分析结果

1.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结构特征

总体而言,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得分为 3.373,处于“比较适应”与“非常适应”之间。具体来说,83.03%的回流农民处于“比较适应”与“非常适应”之间,16.79%的回流农民处于“不太适应”到“比较适应”之间,0.18%的回流农民处于“很不适应”到“不太适应”之间。比较而言,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呈现出“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3.455) >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3.439) >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3.354) >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3.192)”的结构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65.51%的回流农民回到了原居地,34.49%的回流农民回到了新居地,原居地回流农民人数是新居地回流农民人数的 1.90 倍,表明回流农民以原居地回流为主。分回流地类型来看,与原居地回流农民相比,新居地回流农民的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更高,但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更低(见图 2)。可能的原因是新居地回流农民在进行回流决策时,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基础设施更完善、环境卫生更整洁等更能满足物质文化发展需求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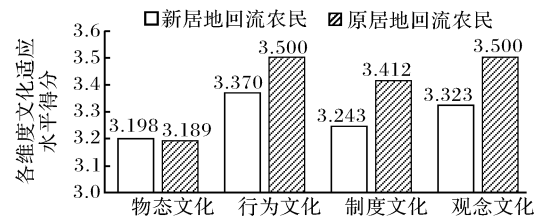


图 2 各维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

2.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文化距离、地域认同、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模型 1 是各因素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估计结果,模型 2 至模型 5 依次是各因素对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的估计结果。所有回归模型均用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2.0,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详见表 2。

(1)文化距离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假设 1.1,假设 1.2,假设 1.3)。结果显示:首先,在场时间对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有正向影响,但没有统计显著性,可能的解释是,在社会加速转型期,人们不管在哪里都面临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都要适应出现的新鲜事物。其次,与省内流动的回流农民相比,跨省流动的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降低 0.175 个单位,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假设 1.2 在物态文化再适应维度得到支持。这可能与回流农民多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至中西部地区有关,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较低。最后,回流地类型存在显著影响,与原居地回流农民相比,新居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显著低 0.067 个单位($p < 0.1$),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显著低 0.124 个单位($p < 0.05$)。这说明,回流地类型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假设 1.3 得到支持。

(2)地域认同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假设 2)。结果表明,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度存在显著积极效应,其每提高 1 个单位,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提高 0.170 个单位($p < 0.01$),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依次提高 0.200、0.192 和 0.174 个

单位,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假设2得到支持。

(3)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假设3.1,假设3.2,假设3.3)。结果表明:首先,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规模具有显著积极效应,其每增加1个单位,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提高0.002个单位($p<0.01$),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显著提高0.002个单位。假设3.1得到支持。其次,在回流地的强关系网络密度每提高1个单位,回流农民的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提高0.332个单位,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2在物态文化再适应维度得到支持。最后,在回流地的关系网络融洽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其每增加1个单位,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提高0.130个单位($p<0.01$),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依次提高0.176、0.142和0.117个单位。假设3.3得到支持。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年龄、个体经济地位均与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显著正相关,湖北省回流农民比湖南省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显著更低。

表2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统计项	文化再适应 总体水平 回归1	物态文化 适应水平 回归2	行为文化 适应水平 回归3	制度文化 适应水平 回归4	观念文化 适应水平 回归5
适应情境(文化距离)					
回流地在场时间	0.028 (0.026)	0.024 (0.045)	0.033 (0.030)	0.020 (0.035)	0.037 (0.038)
是否跨省流动	-0.063 (0.056)	-0.175** (0.077)	-0.009 (0.071)	-0.049 (0.075)	-0.088 (0.078)
是否新居地回流	-0.067* (0.038)	-0.027 (0.066)	-0.061 (0.045)	-0.080 (0.056)	-0.124** (0.056)
适应动力(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	0.170*** (0.032)	0.077 (0.054)	0.200*** (0.038)	0.192*** (0.047)	0.174*** (0.049)
适应资源(社会资本)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	0.002*** (0.000)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	0.060 (0.116)	0.332* (0.198)	-0.031 (0.141)	0.013 (0.152)	0.017 (0.163)
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	0.130*** (0.034)	0.032 (0.058)	0.176*** (0.039)	0.142*** (0.047)	0.117*** (0.050)
控制变量					
性别(男性=1)	0.001 (0.038)	0.036 (0.064)	-0.036 (0.044)	0.016 (0.053)	0.031 (0.053)
年龄	0.004* (0.002)	0.000 (0.004)	0.050* (0.003)	0.005* (0.003)	0.005 (0.003)
受教育年限	-0.003 (0.008)	0.012 (0.016)	-0.005 (0.010)	-0.015 (0.012)	0.007 (0.012)
身体健康状况	-0.029 (0.040)	0.013 (0.083)	-0.033 (0.047)	-0.042 (0.051)	-0.055 (0.053)
个体经济地位	0.089*** (0.026)	0.200*** (0.045)	0.059* (0.032)	0.072** (0.036)	0.044 (0.039)
所在地区(参照组:湖南省)					
贵州省	-0.027 (0.045)	-0.021 (0.067)	0.020 (0.054)	-0.124* (0.065)	0.016 (0.066)
湖北省	-0.124** (0.049)	-0.291*** (0.090)	-0.051 (0.055)	-0.152** (0.067)	-0.041 (0.071)
四川省	-0.003 (0.050)	-0.242** (0.097)	0.067 (0.062)	0.020 (0.070)	0.097 (0.072)
常量	2.155*** (0.304)	2.381*** (0.503)	1.966*** (0.368)	2.210*** (0.417)	2.271*** (0.418)
观测值	548	548	548	548	548
R^2	0.222	0.097	0.203	0.170	0.129

注:①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②*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后表同。

3. 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本文通过更换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测量方式、对自变量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进行双边缩尾处理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表 3。具体而言,运用因子分析及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因子得分,将新生成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模型 6 所示。由于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存在极端值,尽管前文已对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进行了 1%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但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又对该变量进行了 5%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模型 7 所示。估计结果与已有分析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本研究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4. 文化距离、地域认同和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回流农民与回流地的文化距离、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和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会影响其文化再适应水平。既有研究强调适应情境、适应动力、适应资源的代际差异^[10,48-49],本文检验文化距离、地域认同和社会资本在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上是否

存在代际差异。以出生年份 1980 年为标准,将回流农民分为新生代组和老一代组。表 4 报告了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 8 和模型 9 的结果显示,回流地在场时间显著提高了老一代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beta=0.076, p<0.1$),跨省流动、新居地回流显著削弱了新生代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 -0.146 和 -0.153 ,分别在 10%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省外流动、新居地回流经历是影响新一代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障碍因素,与之不同的是,回流后在当地生活时间越久,老一代回流农民越能缓解因曾经“缺场”造成的文化不适应状况。模型 10 和模型 11 的结果显示,在老一代组和新生代组,对回流地地域认同度均显著提高了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 0.213、0.180,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其对新生代回流农民的影响更大。模型 12 和模型 13 的结果显示,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均显著提高了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对老一代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264,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关系网络是回流农民重要的社会资源,不同的是,血缘、亲缘等继承性关系网络是老一代回流农民的重要社会资本,而业缘、趣缘等发展型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社会资本。这种代际差异也恰恰说明了时代变迁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变化。

表 4 文化距离、地域认同和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统计项	新生代 模型 8	老一代 模型 9	新生代 模型 10	老一代 模型 11	新生代 模型 12	老一代 模型 13
适应情境(文化距离)						
回流地在场时间	0.038 (0.038)	0.076* (0.039)	—	—	—	—
是否跨省流动	-0.146* (0.085)	0.019 (0.078)	—	—	—	—

表 3 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统计项	文化再适应 总体水平因子 模型 6	文化再适应 总体水平 模型 7
适应情境(文化距离)		
回流地在场时间	0.033 (0.031)	0.028 (0.026)
是否跨省流动	-0.079 (0.065)	-0.061 (0.056)
是否新居地回流	-0.078* (0.044)	-0.067* (0.038)
适应动力(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	0.200*** (0.038)	0.170*** (0.032)
适应资源(社会资本)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	0.002*** (0.001)	0.002*** (0.001)
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	0.079 (0.137)	0.058 (0.132)
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	0.150*** (0.039)	0.129*** (0.03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1.445*** (0.353)	2.148*** (0.306)
观测值	548	548
R ²	0.223	0.224

续表

统计项	新生代 模型 8	老一代 模型 9	新生代 模型 10	老一代 模型 11	新生代 模型 12	老一代 模型 13
是否新居地回流	-0.153*** (0.053)	-0.050 (0.058)	— —	— —	— —	— —
适应动力(地域认同)						
回流地地域认同	— —	— —	0.213*** (0.039)	0.180*** (0.056)	— —	— —
适应资源(社会资本)						
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	— —	— —	— —	— —	0.003*** (0.001)	0.002** (0.001)
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	— —	— —	— —	— —	-0.113 (0.173)	0.264* (0.146)
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	— —	— —	— —	— —	0.106** (0.043)	0.251*** (0.05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2.833*** (0.352)	3.581*** (0.244)	1.926*** (0.368)	2.971*** (0.311)	2.518*** (0.348)	2.732*** (0.272)
观测值	305	243	305	243	305	243
R ²	0.109	0.074	0.163	0.109	0.138	0.184

五、结论与讨论

关于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现状,学界有“适应”与“不适应”两种观点;关于影响因素,既有研究对适应动力、适应资源及部分适应情境的关注不多。基于课题组在湘、鄂、川、黔四省的调查数据,本文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验证了上文提出的大多数假设。首先,尽管多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较高,但仍然不乏文化再适应困难的回流农民;尽管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较高,但仍然存在着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滞后于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问题。在文化堕距论看来,在文化变迁过程中,通常是物质文化系统变迁先于制度文化系统变迁,制度文化系统变迁先于观念文化系统变迁^[50]。而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结构性特征与之并不一致。这种差异恰恰折射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现代治理水平和理念文化方面的显著差异。其次,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是受到适应情境、适应动力和适应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与回流地的文化距离尤其是回流地的文化差异是导致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困境的重要情境因素;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是促进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重要动力因素;在回流地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关系网络融洽度是提升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重要资源因素。同时,文化距离、地域认同与社会资本因代际差异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

文化距离的影响体现为:与原居地回流农民相比,新居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更低,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更低;与省内流动的回流农民相比,跨省流动的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显著更低。地域认同的影响表现为: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度越高,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越高,其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越高。社会资本的影响表现为: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有显著正效应,回流地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越高,其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越高。回流地强关系网络密度仅对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流地关系网络融洽度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存在显著正效应,关系网络融洽度越高,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越高,其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也越高。

上述发现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雁归巢”渐成常态,回流农民在带动当地发展上的领头雁作用初显。要形成“雁阵效应”,需要政府的积极回应。

第一,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缩小区域间物态文化距离。要切实改善中西部地区交通环境和卫生环境,提升中西部地区生产生活便利度和环境友好度,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物态文化差异。

第二,加强中西部地区公共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缩小区域间制度文化距离,提升回流农民地域认同感。相关研究表明,民众信心不足会催生经济风险与社会危机^[51],对民众社会态度的把握与心理建设至关重要^[52]。一方面,要聚焦工商行政审批、就业创业金融支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土地流转制度等事关回流农民创业就业的关键领域,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升回流农民就业创业支持政策的普惠性、可及性。另一方面,创新就业培训内容和形式,提升回流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强化其安居乐业意愿,激发其文化再适应动力。

第三,拓展文化交流平台,拓宽回流农民人际关系网络,提升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能力。首先,要积极整合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和社区的力量,组织开展公众文体活动、文艺表演、志愿公益、趣味比赛等多元化的文化活动,动员、吸引回流农民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其次,强化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充分整合居民(村民)议事会、居民公共服务中心、公共文化广场等文化平台,接纳、吸引回流农民参与回流地文化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氛围,使回流农民在公共文化参与中拓展人际关系网络,进而提升文化再适应水平。

参 考 文 献

- [1]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85, 48(2): 167-235.
- [2] LE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 1966, 3(1): 47-57.
- [3] 张杰, 胡同娟. 从陌生人到返乡者——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生活世界重构[J]. 中国青年研究, 2013(5): 48-54.
- [4] 孟宪范. 回流农民工的变化——基于对返乡打工妹的考察[J]. 江苏社会科学, 2010(3): 85-92.
- [5] 邱仁富. 改善民生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跨越式发展——以返乡农民工为视角[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9, 25(3): 38-41.
- [6] 文军. “被市民化”及其问题——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4(4): 7-11.
- [7] 吴重庆. 孙村的路: 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 [8] 叶芳. 村落文化范式的转换和创新[J]. 青海社会科学, 2007(4): 40-44.
- [9] 陈锋, 徐娜.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2): 63-68.
- [10]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 63-76.
- [11] 符平.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J]. 社会, 2006(2): 136-158.
- [12] 吴孔军, 疏仁华. 返乡农民工的角色认知选择与生存走向[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1(3): 129-133.
- [13] 张艳花, 李耀国, 杨青坪. 农民工提前返乡的危与机[J]. 中国金融, 2009(3): 78-82.
- [14] 徐晓军, 张必春. 论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与集体行动风险[J]. 广东社会科学, 2009(3): 157-164.
- [15] 沈新坤, 习强. 农民工外出和返乡: 村落文化的解构与重构[J]. 兰州学刊, 2010(3): 106-109.
- [16] 刘有安. 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污名化”现象研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2): 121-125.
- [17] 谷玉良. 青年农民工的回流困境[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10): 67-72.
- [18] 李虎. 论“外出打工”的仪式过程与意义——基于桂西壮乡伏台的田野考察[J]. 广西民族研究, 2014(2): 79-86.
- [19] TAJFEL H 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 Salt Lake City, USA: American Academic Press, 1978.
- [20] WARD C, KENNEDY A. Where's the “culture” in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journer adjustment[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3, 24(2): 221-249.
- [21]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5): 107-122.
- [22] 马威, 罗婷. 行动中的文化: 乡—城移民子女文化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J]. 青年研究, 2014(3): 1-10.
- [23] LIN N.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C]//PETER V M, LIN 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 A.: Sage, 1982: 131-145.
- [24] RICHMOND A H.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conflict in immigrant-receiving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84, 36(3): 519-536.
- [25] WILSON B A, BERRY E H, TONEY M B, et al. A panel based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race/ethnicity and other individual level characteristics at leaving on returning[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9, 28(4): 405-428.
- [26] 刘霞. 选择与规制之间: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返乡调查[J]. 青年探索, 2014(2): 5-10.
- [27] 曹志刚, 孟芳萍. 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返乡婚嫁的影响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9): 23-28.
- [28] 张岱年, 方克力.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29] 江立华, 卢飞. 农民工返乡消费与乡村社会关系再嵌入[J]. 学术研究, 2015(3): 40-46.

- [30] 李强,李凌.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城市适应——文化适应的视角[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29-139.
- [31] 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M].潘亚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
- [32] 陈慧,车宏生,朱敏.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3(6):704-710.
- [33] ECCLES R G, NOHRIA J.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 [34] 纪志耿.资源与亲情双重张力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四川模式”及其挑战[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6):54-59.
- [35] 周爱民.社会认同理论综述及对征地拆迁社会矛盾化解的启示[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6(4):52-56.
- [36] 梁彩花,周金衢,张琼.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行为的社会心理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0(4):170-174.
- [37] HODGKIN M C. The innovators: the role of foreign trained persons in Southeast Asia[M].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2.
- [38] 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 1997, 46(1): 5-34.
- [39] 叶继红.农民集中居住、文化适应及其影响因素[J].社会科学,2011(4):78-86.
- [40] 高梦媛,郑欣.文化自觉: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J].中国青年研究,2013(7):72-78.
- [41]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42] 赵娟.社会网络对主动回流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2:31-32.
- [43] 魏爱春,李雪萍.关系网与生命周期:家庭抗逆力本土化研究的维度拓展[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2):36-42.
- [44] 叶传忠.现阶段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J].企业导报,2009(11):35-36.
- [45]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1-18.
- [46] 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J].社会学研究,2003(5):58-69.
- [47] BABIKER I E, COX J L, MILLER P M. The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dista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edical consultations, symptomatology and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tudents at Edinburgh University[J]. Social psychiatry, 1980, 15(3): 109-116.
- [48] 林晓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框架[J].学术论坛,2016,39(11):99-104.
- [49] 刘友富,李向平.“逆城市化”还是“伪城市化”?——反思大学生、农民“离城返乡”问题兼与沈东商榷[J].中国青年研究,2017(6):24-30.
- [50]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51] 刘世定.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J].社会学研究,2009,24(2):27-38.
- [52] 魏钦恭,刘伟.灾害冲击、社区韧性 with 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基于云南民族地区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0(4):70-89.

(责任编辑:陈万红)